家庭互动模式对大学生婚恋观影响研究

沈　纪　陈思颖　单可艺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借鉴家庭环状模型,基于家庭权力系统理论,从沟通和决策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家庭互动模式类型:良好沟通和有决策的家庭权威导向型、不良沟通和有决策的家庭专制型、良好沟通和无决策的家庭平权型以及不良沟通和无决策的家庭无序型。研究发现,家庭权威基于个体魅力、自然化的认可和敬仰,可以有效帮助子女建立情感关系的安全感与信任感,重视并复制良好的沟通和决策模式,从而形成积极的婚恋观。家庭专制型、家庭平权型和家庭无序型则由于权威导向的缺失,容易使子女形成消极的婚恋观。由此,本文提出在家庭权威缺位的情况下,塑造子女积极婚恋观的两种可行路径:一是塑造家庭成员共同认可的权威家风;二是营造社会导向性权威氛围。

【关键词】大学生　婚恋观　家庭互动模式　沟通与决策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4.016

一、问题提出

青年群体婚恋观作为预测未来人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婚恋和生育成为时代热点话题之一。然而,一项针对18－26岁未婚城市青年婚恋观的调查显示,低婚恋意愿(不想恋爱或结婚、不确定会不会恋爱或结婚)成为当前青年婚恋观的主要特征之一。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婚姻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20－29岁处于婚姻状态的人群比率为69.2%,将比2013年下降8个百分点[1]。

青年婚恋观背后反映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社会转型、个体主义价值观、婚育的经济压力等[2-3]。然而,青年婚恋观更多地折射出家庭因素在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心理学视角下,家庭结构、家庭互动模式、家庭氛围等因素会塑造个体主要的心理特征,对个体的人际交往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婚恋态度和婚恋行为[4-6]。

已有研究主要采取定量研究方法[7-8],通过质性研究深度挖掘家庭对青年婚恋观塑造的作用机制的成果则相对较少。虽然定量分析有利于把握较大范围的总体情况,但对家庭领域而

收稿日期:2022－05－05
作者简介:沈　纪,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儿童与青少年发展、社会分层与流动;
陈思颖,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
单可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健康与认知发展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SRC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言却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无法深入考察家庭互动模式、探寻家庭生活的丰富表象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个体生存和抵御社会不良影响的重要场所。青年婚恋观不仅影响社会的整体稳定和发展,也决定了国家未来的人力资本建设。分析家庭互动模式对青年婚恋观的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大学生群体(20 – 22岁)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二、文献梳理与分析

(一)权威与专制

婚恋观指人们对恋爱和婚姻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其不仅决定个体对恋爱和婚姻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也决定个体在恋爱和婚姻实践中的行为模式。大学生群体婚恋观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末,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他们对择偶标准、性观念、婚恋态度等的看法以及婚恋观的影响因素等[9-11],通过质性研究分析婚恋观形成机制的研究较少。

家庭作为个体所处的最近端环境,直接决定了个体的价值取向。每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会形成人际交往不同的风格,拥有自身独特的情感观念,进而塑造不同的婚恋态度[12]。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婚恋观受到原生家庭的代际传递影响,尤其是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13]。

家庭教养方式,主要是指父母与子女交流过程中的态度组合形成的情感氛围,其划分主要基于西方心理学研究视角。鲍姆林德提出家庭教养方式这一概念,并区分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溺爱型(permissive)三种[14]。麦考比在其基础上,从要求(demandingness)和回应(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进一步增加了忽视型(neglecting)[15]。其中要求表示父母对子女建立的标准和规范;回应则是父母对子女关心和爱的程度。在高要求、高回应构成的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下,子女更愿意谈恋爱,心理社会调整更好,恋爱满意度更高[16-17]。权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又给予一定的自主性,表达支持和鼓励的程度较高。专制则是要求严格的强制执行,子女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也缺少支持和鼓励。

尤其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渗透,强调家庭互动的平权意识和平等主义规则越来越被认可和流行。在中国,传统封建制家国一体思想下长期塑造的家长绝对权威地位,带来家庭权威的污名化,形同于专制。即便家庭平权的情感关系取代了不平等的专制式关系,平等的家庭价值观念依然陷入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陷阱,走入另一个极端,即过于强调平等而失去了家庭教育的权威。现代家庭教育更改了自上而下的服从模式,呈现出追求平权的积极趋势,但它并没有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而是出现家庭教育无力和异化的后果[18-19]。婚恋观塑造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子女如何看待家庭权威,对其婚恋观会产生什么影响,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沟通与决策

本文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沟通”和“决策”两个维度分析家庭互动模式。其中,沟通维度指家庭互动的过程,主要借鉴夫妻和家庭系统环状模型(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决策维度主要基于家庭权力系统理论,指家庭互动的结果。

家庭环状模型基于家庭治疗的实践观察,提出从凝聚力(cohesion)、灵活性(flexibil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三个维度考察家庭系统[20-21]。凝聚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灵活性指领导力、角色关系和关系规则的变化;沟通则是一个促进维度,良好的沟通可以促进家庭系统的凝聚力和灵活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发展或情境需求,发挥家庭功能。沟通的测量主要关注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倾听技巧、表达技巧、自我披露、尊重等，这些也是家庭教养方式中“回应”维度的一种体现。

福柯提出，权力无所不在，家庭也不例外。家庭权力是“即使对方反对也能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其基础由个体所拥有的资源组成，实施过程则体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影响，结果是谁决策和谁取胜[22-23]。目前，对家庭权力的测量主要集中在结果上，即夫妻之间关于家庭事务的决策。然而，对于家庭关系中的子女来说，对家庭权力的理解，往往更多是主观体会，而非客观表现。换言之，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包含个体情感和主观性评价的成分。

在沟通和决策两个维度下，可以区分出以下四种类型：良好沟通和有决策的家庭权威导向型、不良沟通和有决策的家庭专制型、良好沟通和无决策的家庭平权型、不良沟通和无决策的家庭无序型（如图1所示）。其中，良好程度的测量并未按照问卷形式获取，而是以子女感知的良好程度为准。以家庭教养方式为例，其问卷的编制者也指出，问卷测量的仅是“感知到的教养方式”，更多是报告方主观加工后的信息，而非客观事实，父母和子女往往存在不同的感知差异[24]。有学者指出，质性研究方法甚至比问卷数据分析更能深入了解父母和子女对教养方式的看法，从而为家庭干预提供新思路，如帮助家庭建立正确的沟通方式，促进子女的适应性发展[25]。由此，本研究中关于沟通的良好程度主要依据深度访谈中子女的主观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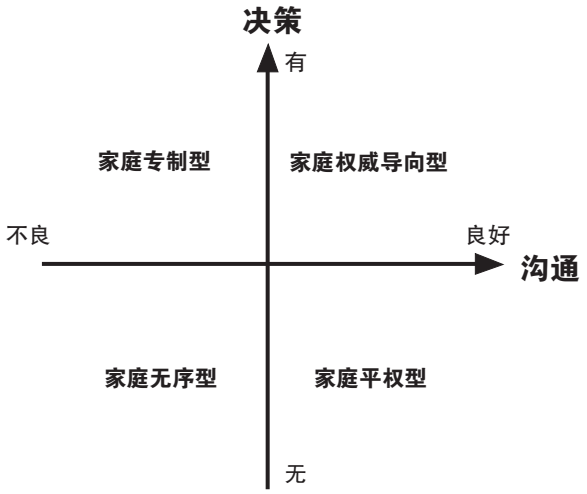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互动模式

此外，本文将婚恋观类型分为婚恋意愿和婚恋信心两个方面。婚恋意愿强调婚恋行为的个体主动性，是意义的建构，婚恋信心则是对婚恋能力的自我认知。在婚恋意愿和婚恋信心两个维度下，婚恋观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分别是愿意结婚且有信心的积极婚恋观、愿意结婚但无信心或不愿意结婚但有信心的模糊婚恋观、不愿意结婚且无信心的消极婚恋观（如表1所示）。

表1　婚恋观

		婚恋信心	
		有	无
婚恋意愿	愿意	积极：愿意结婚、有信心	模糊：愿意结婚、无信心
	不愿意	模糊：不愿意结婚、有信心	消极：不愿意结婚、无信心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本文在建立上述理想类型的基础上，尝试探析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婚恋观的作用路径。需强调的是，本文所指的沟通和决策主要基于家庭中子女自身的主观感受。决策考察的是家庭中有无被认定的权威，并非实际的权力；沟通考察的是家庭中感受到的交流方式，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事实。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深度访谈，于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期间，倾听大学生群体对家庭互动模式和婚恋观的声音。为避免找到的家庭互动模式过于集中于一种类型，我们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筛选，以确保四种类型的家庭互动模式均有涵盖。最后，确定受访者为20名[①]大学二年级至大学三年级学生（接受访谈时所处的年级），主要来源于北京高校，涉及各类专业学科，10名女性，10名男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样本的差异化要求。此外，为了控制家庭结构的影响，本文选取的均为正常婚姻状态的家庭子女，即父母处于婚姻存续期间。

表2　受访者基本信息

序号	性别	专业	家庭互动模式	婚恋观
A1	女	木材科学与工程	家庭专制型	消极
A2	女	英语师范	家庭平权型	消极
A3	女	社会工作	家庭平权型	消极
A4	女	国际贸易	家庭平权型	模糊
A5	女	旅游管理	家庭无序型	消极
A6	女	汉语言文学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A7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A8	女	法学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A9	女	汉语言文学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A10	女	生物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B1	男	社会工作	家庭专制型	消极
B2	男	医学	家庭专制型	消极
B3	男	法学	家庭平权型	模糊
B4	男	政治学与行政学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B5	男	政治学与行政学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B6	男	社会工作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B7	男	历史师范	家庭权威导向型	积极
B8	男	日语	家庭专制型	消极
B9	男	法学	家庭平权型	模糊
B10	男	政治学与行政学	家庭无序型	消极

① 以往研究多侧重于采用大样本数据分析何种家庭因素会对子女婚恋观产生影响，缺乏家庭互动模式与子女婚恋观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比如，罗伊斯曼等人（Roisman et al.，2009）通过问卷调查（N=957）发现，父母的有效回应更有助于子女拥有高质量的婚恋关系；黄和林（Huang & Lin，2014）针对一项大学生群体（N=1113）的调查发现，家庭冲突会导致子女对婚姻持负面态度。在这些大样本数据研究基础上，本文运用深度访谈进一步挖掘家庭互动模式如何影响子女婚恋观。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婚恋观塑造的作用路径

根据心理学中的“无意识”理论，子女在与父母共同生活时，会潜意识内化他们所感知到的、经历过的家庭互动模式，并形成自己对情感关系的评价。换言之，子女在家庭内无意识获取的记忆、思维方式、情感和经验，会塑造自己的家庭观念和行为。若在家庭内接触到良好的互动模式，子女往往会习得这种模式，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婚恋的信心。反之，不良的家庭互动模式会导致他们下意识对建立家庭产生显性或隐性的负面倾向，如恐惧和逃避婚恋行为。本研究发现也验证了这种作用路径，即家庭权威导向型互动模式更能建立子女积极的婚恋观，而家庭专制型、家庭平权型和家庭无序型则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家庭权威导向型—积极婚恋观

以往研究认为，夫妻权力要么是夫妻双方各种资源对比的结果，要么是由特定的（以男性统治为特征的）社会性别规范引导[26-27]。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家庭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一方并非简单地由资源决定或社会性别实践建构。在子女眼中，良好的家庭权威更多是韦伯意义上的魅力型（charismatic）存在，是自然化的令人认可和敬仰，可以发挥避免家庭分裂、节约家庭资源、纠正发展偏误的正向作用。这种家庭权威并不再局限于男性统治的父权制规范，它超越了性别的区隔。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夫尊妇卑”的等级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观念、“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模式等塑造了男性中心观念的“象征暴力”[28]，也塑造了男性家庭地位高于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认同[29]。然而，即便有传统父权制的影子，家庭权威的树立也更多是基于个体魅力的展现。

“我妈比较有个人魅力，可能因为她事业比较成功，也很孝顺。她有足够的个人魅力，别人会主动地服从。我妈的权威也使家人逐渐地互相理解、和谐相处，能节省家庭资源，特别是避免时间的消耗。”（B6）

“我爸是家里的权威，但不是道德权力上的，而是基于知识阅历让人信服。他不是传统型家长式或家父制的权威，是偏向韦伯式的法理性权威，靠语言的力量、靠理性和交流让你认同。你做错一些事情时可能自己没意识到，有一个权威给你提醒，给你纠正，可能会不容易走弯路。”（B7）

访谈也发现，家庭权威并不一定固定在某个家长身上，而是根据具体情境呈现出灵活变化，从而达成家庭系统内部的平衡稳定。换言之，家庭权威基于良好的沟通和有效决策。通过沟通，决策的主体会因不同事务类型而发生变化。有时候，子女也会掌握一定的决策权，尤其是与自己学习相关的事情。

“我们家会倾听各方意见，学习有关的决策主要是我自己做，比如高考填报志愿、升学等，主要是基于我的个人意愿，父母在整个决定过程提供一些建议和支持。”（A8）

“家里面一些大事，比如要不要借钱，倾向于听爸爸的；家里的小事，比如今天吃什么，就会倾向于听我妈妈的。尽管大事爸爸决定，但也会充分考虑我们的意见，他不会专制。比如我以后考研，家里会给我意见，可最终他们还是把选择权给我。”（A10）

在家庭权威导向型下，子女往往更易产生安全感，并复制家庭中的良好沟通模式，从而形成积极的婚恋观。

一方面，家庭权威的存在，会帮助子女建立情感关系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进而建立对社会权威的认同，更利于个体的社会化。家庭权威导向型的访谈对象表示，“权威存在的好处就是，它会带来一种便利性，一种成长的安全感。比如，更宏观层面的权威，是没有办法忽略的，我们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慢慢长大了反而会越来越服从于更宏观的权威”(B5)。在对家庭权威的认可下,子女更容易赞成主流的婚恋价值观,对婚恋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有婚恋的意愿和信心,认为“婚姻和恋爱还是很美好的”(B4),“婚姻的意义就是你找到了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存在。父母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希望的以后和伴侣的相处模式”(A10)。另一方面,家庭权威导向型互动模式更有助于子女重视并复制良好的沟通和决策模式,从而形成积极的婚恋观。他们能识别出家庭权威不是强迫式服从,并意识到家庭权威应塑造什么样的子女。他们指出,“有两种权威,一是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主动服从,这是一种正向权威;二是个人构造的‘权威’,但并未有令其他成员绝对信服的个人魅力,成员迫于无奈的服从”(B6)。“家庭权威不是塑造‘妈宝男’和‘乖乖男’那种,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能从家庭里脱离出来,和社会沟通、接轨”(B5)。在这样的认知下,他们更注重沟通,重视情感交流及其所达成的理解和包容,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情感交流技巧,进而对未来的婚恋行为充满信心。

“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建立主要受家庭影响,我对婚姻也充满信心,对自己的爱情观、婚恋观有信心,自己能尊重和理解另一半。同时也相信自己遇到的她也是一个能互相理解、宽容的人。”(B7)

“一个家庭里如果要维系关系,沟通非常重要,可以化解矛盾,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我非常憧憬婚姻,对自己的婚姻也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对婚姻抱有的这种积极态度,可能是因为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A8)

(二)家庭专制型—消极婚恋观

家庭专制型虽有决策,但沟通较差。这种家庭互动模式往往和“强势”“控制欲”挂钩,是家长对子女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没有家长和子女横向的良好沟通,这也正是家庭权威污名化的来源。比如,有受访者表示,“孩子在和父母交流过程中如果存在‘权威’就会使沟通产生很大的交流障碍,造成话语权的不平等或者表达的不顺畅”(B8)。“我的妈妈是‘权威’,我现在对她的一些要求、施予的强压已经麻木了,都不想去反对她,就很疲惫”(B2)。这种子女口中的“权威”与家庭导向性权威的主要差异在于沟通方式,前者容易导致子女产生压力感和疲惫感,后者则是带来认同感。虽然沟通方式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个体职业、性格特征等差异,但在家庭互动中,我们更关注沟通的结果,即子女的切身感受。

“我是北京孩子,但周末不想回家,就是因为不想看到母亲,和她沟通太困难了。我妈性格很强势,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她的决定很离谱,我就会和她吵起来。”(B1)

“我爸的控制欲很强,而且是一个过度理性、刻板严厉的人,脾气比较大。说白了,他对我的控制就是要求必须听话,我必须对他很服从,所以比较累。”(A1)

在家庭专制模式下,子女的自主选择权几乎处于缺失状态,即便尝试沟通和表达,也仅仅是“无力的反抗”,同时子女对消极沟通的感受也影响了亲子关系,家长的绝对化要求使子女彻底放弃了沟通。这也反映出在家庭代际权力关系上,个体主义和传统养育文化在不同世代之间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30]。我国家长往往具有较强的责任感,要为子女包办一切,家庭决策带有为子女服务的“操心”成分,体现的是责任而非权力[31]。这种家庭代际权力关系甚至会持续到子代建立自己的夫妻生活,形成全方位的干预和规训。

“从小到大,学业、恋爱、工作等基本都是她安排的。比如我高考成绩下来之后,我想自己做决定报学校,想考地理类的,但我妈妈偏叫我学别的,说学地理没前途。总之就是沟通了也没用,以后走她为我铺好的路就可以了。”(B2)

“初中和高中填志愿基本是爸爸决定的,小学、初中还没事,但到了大学之后,就有很多矛盾了,可能是需要决策的重大事项多了起来。”(B8)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家庭专制型互动模式会导致子女形成对家庭权威的错误认知，再生产家庭专制型路径。在询问受访者“什么样的家庭互动模式最理想”时，B1表示：“我是百分百的‘权威’。如果未来成立家庭，我就会这样要求。因为沟通实在太累了，有时候花了很久去沟通都没有用，或者沟通变成了争吵，根本展开不了有效沟通。与其说我大费口舌去说服他人，还不如我直接把决定做好”。成长于家庭专制模式下的孩子，不仅体会到沟通不畅，也经历了专制下的贯彻执行。这些体验和经历会无意识地形成对家庭权威的认知是忽略沟通、只需决策的“专制”。虽然有的家庭专制会让子女识别出家庭权威是良好沟通和决策的结合，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的专制，但因子女长期受到压抑，个体能量式微，导致对婚恋没有信心，与他人建立关系存在困难。受访者B2表示，“母亲使我比较内向，平时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和人沟通，尤其是异性”。同时，长期的专制会增加子女的心理压力，从而自我封闭，对亲密关系产生消极看法。

“他（指父亲）总是会硬性要求我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我也不喜欢他和我交流的方式，很纠结，也很压抑。这些导致我对自己的感情有一定封闭，我不想谈恋爱。”（A1）

“在家里父母“权威”感很强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家庭让我的抗压能力很弱，心理比较脆弱。父母没有给我树立一个好榜样，我谈恋爱、结婚的意愿都不高。”（B8）

（三）家庭平权型—消极或模糊婚恋观

在现代化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父权制规范是家庭权力分配的关键。平权意味着社会现代化文明程度更高，更有利于社会进步。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庭平权型反而不利于家庭整合。即便有良好的沟通，在无有效决策的情况下，也难以促进家庭系统的凝聚力，无法充分发挥家庭功能。有访谈对象表示，家庭过于信奉平权主义，反而无法满足子女对决策的需要。在家庭成员意见不统一时，因缺少权威的决策者，往往容易形成“次团体”，导致家庭团结和温暖程度的降低，不利于家庭情感稳定。

“小时候，我爸妈就和我说，我们是平等的，那时候还觉得挺好的。但现在我长大了，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模式了，特别想要家庭中有一个决策者。而且我觉得我家不是很团结，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嘛，每个人的观点都有被采纳的可能，所以为了自己的观点能够被采纳，我经常找我爸结盟，我俩统一观点，联合起来对付我妈，反正少数服从多数，我的观点就能被采纳。我觉得这样其实挺不好的，感觉像在搞孤立一样。”（A2）

“我家不像一般人的家里分长幼卑尊，我爸妈都很认同开放、平等。但我家有那种类似于家庭联盟的存在，我爸妈经常联合在一起反对我，我就有种被孤立、被敌对的感觉。我感觉家庭内部是有点分裂的，不太团结，有时觉得我和他们很疏远。”（A3）

此外，家庭平权型在子女眼中，不仅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稳定的信条”的缺失。家长通过良好沟通，不做决策，让子女去充分探索社会规则，这本是一种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体现，但我们的访谈对象表示，“从小他们就更偏向于让我自己去探索，有时候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说实际点，更多的时候是一件坏事”（A4）。一是缺少家庭权威引导，导致子女对社会规则了解不深，容易经历挫折，甚至出现行为偏差；二是权力过于松散，规范约束不足，容易感情用事。

“我家真的是绝对平权，但我真的很不喜欢。我觉得家里没有“导向”，就像缺少指路灯一样的那种存在。如果他们能够早些告诉我规则、规矩，或者方法、捷径，有的南墙我完全可以不撞。我家很感情用事，没有那种稳定的信条。”（A4）

“家里有必要存在一个权威，起到一个引领性作用。我观察到一些身边特别优秀的人，实际上他的家长并不是特别“开放”的。有的赞赏“民主”的家庭，但孩子年纪小、经验少，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最后这个孩子可能养成很多坏习惯。”（B9）

在家长平权型互动模式下，子女难以感受到家庭权威的引导，甚至缺少家庭温度，家庭凝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聚力不强，子女未来组建家庭的动机较弱。平权意识和原则是社会普遍提倡的，但在家庭场域内，缺少家长引导的平权会使子女的个性化特征被放大，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容易感情用事，把理想化情景带入社会生活，对组建家庭的传统社会观念产生质疑，生育意愿也较低。有受访者表示，“虽然家庭对我的婚恋没有什么约束，但我找不到一个方向和目的，有时候觉得生活没有意义”（B9）。同时，平权隐藏下的家庭内“多数人的暴政”“次团体”等也会让子女难以体会亲情的温暖，婚恋意愿变弱。“有一种我没有体会过真正亲情的感觉，未来我不太想组建家庭”（A3）。

“回家就觉得烦躁，父母一直没有给我规则导向，导致我不想随着主流声音走，有时候会有一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感觉。我不太想结婚生子。”（A4）

“未来组建家庭是不是都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想法，然后通过“统一意见”去控制别人？有点走向团结和温暖的反面，我不会主动去谈恋爱。”（A2）

（四）家庭无序型—消极婚恋观

调查还发现一类无序型的家庭互动模式，即家庭沟通不畅，且无决策。不同于家庭教养方式中低要求、低回应的“忽视型”，无序型家长回应了子女，但回应的方式和结果并不好，即沟通效果不佳，决策缺失，对子女成长没有发挥任何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家庭中沟通和决策的缺乏，使得家庭中的个体呈现出零散化、孤立化，个体间的差异日益扩大，长期发展使得家庭架构松散，成员间情感淡薄，难以为子女提供维持良好亲密关系的榜样和模式。

“我不是很会交际，长大以后有一些人际方面的困扰，就想跟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另外，我平时碰到一些学业方面的压力，我也会跟父母坐下来讲，但是一般都是不了了之，也没有最后的决定，这件事情就过去了。”（A5）

“我们家是三个人名义上的民主，都觉得自己是“权威”，都觉得自己更有道理，所以容易争执不休。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由，不愿意让步。”（B10）

无序型家庭互动模式下的子女往往对婚姻没有信心，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正是家庭权威导向的缺失。在受访者眼中，自己对婚姻没有信心的原因在于权威人物的缺位使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支持和教导，沟通的缺少使自己边界感较强，鲜少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若家庭只是满足基本生活和学习需要，没有家庭权威的决策和引导，则会导致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也失去脱离原生家庭不良互动模式、建立全新家庭互动模式的信心。有受访者明确表示，“我觉得家里需要有一个人能站出来，遮风挡雨做顶梁柱，他/她有能力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指导和帮助”（B10）。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权威可以终结不良沟通和没有决策的无序状态，从而实现对家庭教育的促进作用。

“我对婚姻没有信心，原因在于我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一些沟通、一些权威的树立。我妈只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我也没有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做人和教育的权威。权威能教给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意识、长辈观念、朋友观念，还有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诚信底线、要礼貌。或者说我爸没有给我支撑、勇气和力量，缺的就是这些。”（A5）

“我觉得父母是孩子对婚恋的基准线。比如我们家交流经常是带着情绪化的、不尊重的、不能站在对方角度的，这些导致我也不能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能从对方角度出发去看问题。”（B10）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参照家庭环状模型，基于家庭权力系统理论，从沟通和决策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家庭互动模式的理想类型：良好沟通和有决策的家庭权威导向型、不良沟通和有决策的家庭专制型、良好沟通和无决策的家庭平权型以及不良沟通和无决策的家庭无序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述四种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婚恋观的作用机制。婚恋观主要从婚恋意愿和婚恋信心两个层面建构，愿意结婚和对婚恋有信心的为积极婚恋观，愿意结婚但无信心或不愿意结婚但有信心的为模糊婚恋观，不愿意结婚且无信心的为消极婚恋观。

通过对20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发现，家庭权威基于个体魅力、自然化的认可和敬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源决定和社会性别的实践建构。它是良好沟通和决策的有效结合，可以发挥避免家庭分裂、节约家庭资源及纠正发展偏误的正向作用。家庭专制型仅有决策而无良好沟通，形成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干预和规训，建构了社会对家庭权威的污名化。家庭平权型不利于家庭整合，容易在家庭内部形成“次团体”，缺少对社会规则的引导，规范约束力度不足。家庭无序型虽很少见，但因缺少决策和良好沟通，也非常不利于子女的成长。

权威导向型家庭互动模式往往更易塑造子女的积极婚恋观。一是可以有效帮助子女建立情感关系的安全感、信任感，以及对社会权威的认同感，更有利于个体社会化。二是可以帮助子女重视并复制良好的沟通和决策模式，从而形成积极的婚恋观。家庭专制型、家庭平权型和家庭无序型容易形成模糊或消极的婚恋观。家庭专制型导致子女形成对家庭权威的错误认知，再生产家庭专制型互动模式；虽然有的家庭专制可以帮助子女识别出家庭权威不是支配和服从，但长期家庭专制会增加子女的心理压力，从而对婚恋产生消极态度。家庭平权型由于缺少家庭权威的引导，不仅会对组建家庭的传统社会观念产生质疑，还会因隐藏的家庭内“多数人的暴政”而让子女难以体会家庭的温暖，导致婚恋意愿低下。家庭无序型则由于家庭权威导向的缺失，致使子女对人际交往和婚恋缺乏信心。

形成社会网络和满足个体需要是家庭具有的两个重要功能，前者涉及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后者包括家庭成员的生理需要和情感需要。然而，家庭专制型、家庭平权型和家庭无序型的互动模式，不仅无法给子女提供充分的情感需要，还塑造了消极婚恋观，阻断了其与社会建立联结的可能。

由此，我们提出塑造子女积极婚恋观的两种可行路径。一是塑造家庭成员共同认可的权威家风。比如，通过家庭会议订立家规，实现有效沟通和决策，树立权威规范。家庭会议可以充分发挥沟通协商作用，对子女婚恋观进行正向引导；家庭规则可以发挥决策作用，明确家庭角色规范和分工。权威家风是对家庭权威的物化，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家庭权威被个体独占或泛化导致的专制或平权。二是营造社会导向性权威氛围。伴随个体的成长，社会对其婚恋观塑造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尤其是成长于不良家庭互动环境中的子女，更需要引导他们抽离不良互动模式，寻找社会导向性权威模范，或是引导其所在的家庭参与社会组织开展的促进家庭良性互动的相关活动，建立家庭内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良性循环系统。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本文更多是从子女的视角进行分析，忽略了家长的声音。二是家庭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婚恋观的影响必然存在阶段性效应，同时还存在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纳入家长的话语、家庭动态变化情况和社会因素，也是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载《光明日报》，2021年10月8日。

[2] 钱嫦萍：《青年婚恋情感的异化境遇与破解之道》，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7期。

[3] 康义金：《个体化作用下的“母胎单身”形成机制——以城市青年为例》，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2期。

[4] 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New York：Jason Aronson，1993，pp.109 – 113.

[5][21] Olson D. H.，Waldvogel L.，Schlieff M..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An Update，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2019，(11).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6] 邓林园 赵鑫钰 方晓义:《离婚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父母冲突的重要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2期。
[7] Huang Y. C., Lin S. H.. Attitudes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oward Marria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Family Types and Gend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14, (3).
[8][13] 于亚楠:《家庭氛围、教养方式与孩子的婚恋观》,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9] 佘双好 李斌雄:《大学生婚恋道德观的调查分析》,载《青年研究》,1994年第4期。
[10] 王 飞:《当代青年的婚恋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7~34岁年龄段的青年调查数据》,载《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7期。
[11] 李 婷 郑叶昕 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3期。
[12] 寇 彧:《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载《心理学探新》,2002年第1期。
[14] Baumrind D..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1, (1).
[15] McCoby E. E..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 - child Interaction, Handbook of Childpsychology, 1983, (4).
[16] Auslander B. A., Short M. B., Succop P. A.,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1).
[17][30] Yap M. B., Morgan A. J., Cairns K., et al.. Parents in Prevention: A Meta -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ge 18,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6.
[18] 赫 宸 于 伟:《基于民主精神的家庭教育立场探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
[19] 王 红:《孝与非孝:现代家庭孝道教育的两难处境——从近代孝道之争说起》,载《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0][31] Olson D. H..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
[22][27] 郑丹丹:《中国城市家庭夫妻权力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6页。
[23] 张丽梅:《西方夫妻权力研究理论述评》,载《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3期。
[24] Korelitz K. E., Garber J.. Congruence of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A Meta -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6, (10).
[25] 殷锦绣 蔺秀云 等:《家庭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测量、来源及影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6] 徐安琪:《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28] 布迪厄·皮埃尔:《男性统治》,刘 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45页。
[29] 尹 立:《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分析心理学心灵结构简述》,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 彦)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